



思想史研究中心

「通經明史，識體達用」 中心簡訊

网站首页 中心文章 通识教育 成员著作 中心活动 中心成员 资料下载 辑刊投稿 资源建设 中心论坛

思想史首页—中心文章—书评札记—朱子学术研究的启新——评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

朱子学术研究的启新——评束景南《朱熹年谱长编》

曾 亦 2002年11月

历来治朱子学者，尤重年谱。大抵做学问者，皆须讲门径，不得其门径而入，则不免隔靴搔痒，甚而至于郢书燕说之谓，又如何能窥见高墙内的“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治一般人物，尚能隔墙相望，或可说得个一二。而朱子这般人物，墙太高，门太深，不真正寻着个路头进去，终不过是在门墙外“望空揣摩”而已。而朱子之年谱，便是进入朱子学术之门径。

何以治朱子学须重年谱呢？朱子自承其天资鲁钝，这自是其谦辞。然朱子为学数不得其门而入，又，朱子为文，常常数易其稿而后定，这些却是事实。朱子学术一生凡数变，大致言之，从朱子早年师从二刘（白水勉之、子翠屏山）、胡（籍溪宪）开始，又师李延平（侗）是一变，接触湖湘之学又一变，己丑间提出中和新说又一变，自此，朱子主敬致知之“学问大旨”才大致确定下来。至于朱子学术小处之变，则不可胜记矣。如朱子对延平“求中未发”工夫的态度，由初时之“未达”，潭州时则折从张南轩杖，至后来新说之悔，再至后来之微辞，可见朱子学术之复杂。毫无疑问，朱子这种数易其说的经历对其成熟时期的学术留有很深的印记。因此，年谱对朱子学术脉络的梳理就显得尤其重要。毋庸置疑，年谱正是进入朱子学术的不二门径。当然，年谱的重要性不仅在于此，南宋整个道学的发展与朱子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当我们考察几乎每一个学术人物时，都不同程度牵涉到朱子，这也是治朱子年谱之重要的另一理由。

因此，作朱子年谱者世有其人。自朱子歿后，即有门人李果斋方子之《紫阳年谱》、蔡九峰沈之《文公年谱事实》、蔡觉轩模之《文公年谱大略》。后来作年谱者则多因于三门人年谱，“辗转抄袭，面目雷同”，“遂使八百年来陈陈相因，乃至踵讹谬承亦谱谱相同而不自觉矣”（《朱子年谱长编》序）。其中稍可观者，如明戴铣《朱子实纪》、李默《紫阳文公先生年谱》、清洪嘉植《朱子年谱》、王懋竑《朱子年谱》，而王白田懋竑之年谱则又集众谱之大成，尤出诸人之表，然“亦简略疏误，亦未脱旧谱窠臼”。近世治朱子之大家，如牟宗三、唐君毅、刘述先、陈荣捷、陈来诸人，亦多重年谱，然皆不出白田年谱之藩篱。于是，丹阳束景南先生起而作新谱，曰《朱熹年谱长编》，“不以旧谱为标准，不以旧谱为依据”，撇开李果斋以下诸旧谱，直接从原始文献入手，考辨朱熹生平行事。唯此，则“凡旧谱之误皆可得正，凡旧谱之阙皆可得明”（《朱子年谱长编》序），才完全跳出旧谱窠臼，成为一全新之年谱。

束先生自称其谱为“新谱”，其新何在？如其所言，即不由旧谱入手，而直接从原始资料入手建立年谱。这种推倒重来的做法着实不易，亦颇具风险。然观乎所作，则信斯言矣。《长编》资料征引之富，考订之精审，当足以成立一新谱矣。年谱之长在考订，而不在思想，故为之作书评，颇感不易措手。然与其空言誉美之，不若直接就其考订之实以见其长。兹撮取二例以明之。

束先生曾数次向笔者提及他对朱子与佛教徒交往的考订。一般来说，道学家们早年都有过一段出入佛老的经历，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朱子本人亦多次提及其早年受佛教徒的影响，然皆不过泛言之，至于其与佛教徒交往的具体行谊，却不见于朱子自己的叙述，如《文集》、《语类》均未有相关资料。李果斋、王白田诸年谱亦只是提及二刘、胡之喜佛及对朱子的影响，至于朱子本人与佛教徒交往的具体经历，历来是一个空白。束先生认为这是为尊者讳之故。既然朱子自己未叙及之，诸年谱又讳不言之，于是束先生独辟蹊径，从当时佛教徒的记载中却寻找相关线索。

学术界向来以为朱子之学佛主要受业师之一的刘屏山的影响，然而在《朱子语类》卷一百四有这样一条：“某年十五六时，亦尝留心于此。一日在病翁（屏山）所会一僧，与之语。其僧只相应和了说，也不说是不是；却与刘说，某也理得个昭昭灵灵底禅。刘后说与某，某遂疑此僧更有要妙处在，遂去扣问他，见他说得也煞好。及去赴试时，便用他意思去胡说。是时文字不似而今细密，由人粗说，试官为某说动了，遂得举。”此条明显表明朱子之学佛主要不是得自屏山，而是得自一僧。至于此僧为谁，朱子亦未明说。束先生经过非常细致的考订，认为此僧即宗杲高弟子道谦禅师。此在绍兴十四年甲子，朱子年十五，初识道谦禅师。十五年乙丑，朱子年十六，刘子翠为朱子取字元晦，束先生《朱子大传》以为“元晦”与宗杲字“昙晦”有关。此盖束先生之推论，不见于《长编》，《长编》仅列《屏山集》卷六《字朱熹祝词》与《文集》

卷八十二《跋潘甫字序》。观子翠《字词》，朱子字“元晦”乃欲其慕孔子曾、颜之故，大概束先生后来以为不妥而不取此说。十六年丙寅秋，朱子年十七，道谦出世建之开善寺，朱子频向道谦问禅学佛。此据《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及《佛法金汤》卷十五所载朱子《祭谦开善禅师文》中“丙寅之秋，师来拱辰。乃获从容，笑语日亲”为说。又常往竹原庵向道谦师兄宗元问禅。十七年丁卯春，朱子年十八，道谦往衡阳随宗泉，朱子寄书宗泉问禅。此条见于《居士分灯录》卷下《与开善道谦禅师书》，又见于《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佛法金汤编》卷十五及《归元直指集》卷下。绍兴二十年庚午，朱子二十一，道谦自衡阳归密庵，朱子屡至山中，与道谦朝夕咨参问道，书牋往还学禅。此则以释晓莹《云卧纪谈》引道谦《答元晦》书为证。二十一年辛未，朱子年二十二，建斋室名“牧斋”，束先生认为此与道谦名有关，盖“牧”与“谦”皆出于《易》之谦卦：“谦谦君子，卑以自牧也。”可见此时道谦对其影响之深。而其时所作之《牧斋净稿》实为朱子“朱子出入佛老之高潮时期”。二十二年壬申，朱子年二十三，朱子有书致道谦问禅，道谦有答书。朱时恩《居士分灯录》卷下载朱子、道谦问答语，又《文集》卷一《斋居诵经》诗即明此事。四月，朱子访密庵道谦，此由《祭开善谦禅师文》与《牧斋净稿》中诗为证，当在此时。九月，道谦卒，朱子有《祭开善道谦禅师文》，此文收入《佛法金汤篇》卷十五及《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

又一例。关于朱子赴潭州会南轩时的具体内容，历来有诸多争论。最为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朱张“讲论之语，于文集、语录皆无所考”（白田《朱子年谱考异》）。后人论此次会讲，唯据果斋《紫阳年谱》中的两条记录，其一为南轩与朱子之赠行诗与答诗，另一为“是时，范念德侍行，尝言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后来李、洪诸谱皆载之，而白田则力辨其非。就第一条而言，白田否认“深契太极之旨”之说，认为此说“非果斋之旧”，而主张诗中所言之太极非专言之，只是指称性之“未发”，与心之“已发”相对，因此，此条表明朱张在潭州讨论的正是未发已发之中和问题。而就第二条而言，白田亦否认此条的真实性。盖朱子此时站在性未发、心已发这一湖湘学立场，故二子绝无可能在此发生争执。

束景南则直接从原始材料入手，对上述两种看法都不同程度提出了批评。束先生全面否定了王白田的说法：其一，朱张赠行诗与答诗中的“太极”并非王懋竑所说的中和问题，盖此时朱子之中和旧说正与南轩相契，断不可能发生如此激烈争论。束先生《朱子大传》尚有一说，所谓“论《中庸》之义三日夜不能合”系范伯崇所见，而范伯崇来湖湘后一直住在衡山其兄弟处，偶尔才来长沙见朱张，无从看到二人夜夜对榻高论的情景，只有在临别前三四天中朝夕同舟与朱张相随居住在一起，才能亲眼目睹两人日夜讨论争辩的全部情景。其二，束先生似乎也不同意果斋等人的说法，而认为太极问题实际上与“《中庸》之义”是一致的，即都是讨论《中庸》之性的问题。因此，朱张之争论是有的，只不过不在中和问题上，而在对《中庸》的性的理解上。束先生进而认为，这种争论不过是二人对《中庸》的训解注说之不同所致，这就将二人的争论彻底脱离了中和问题的背景。

不过，束先生此说亦有疑处。《中庸》论性与湖湘无对之性、朱子性善之性却未必有关系，此其一也。朱子即便在其旧说时即不同意湖湘之“性无善恶”，如“人自有生”四书中有便有“但性不可以善恶名，此一义熹终疑”之语（《文集》卷三十一，《答张敬夫三十五》），如何又“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因此，一定要肯定朱张争论的真实性，就必须确认这样两个事实：南轩本人此时坚持湖湘性无善恶的立场以及朱子在这个问题上折从南轩，放弃本来之性善之说而取性无善恶说。这是两个颇难解决的问题。就南轩本人而言，此时完全站在乃师胡五峰“性无善恶”的立场吗？因为从南轩后来与其他湖湘学者的交往来看，其对五峰的批评多在此处，不知此说得自朱子，抑或自悟。而就朱子而言，“从君识乾坤”、“始知太极蕴”难道是就性上取得一致吗？白田以为《艮斋铭》是朱张会讲之成果，而《艮斋铭》的主旨则是朱子赞同了湖湘学者“先察识后涵养”的工夫论，而同时之《答何叔京十一》（《文集》卷四十）、《答程允夫第五》（《文集》卷四十一）明显表现了朱子在工夫论上受南轩的影响。盖朱子此时唯在工夫论上折从南轩，而对未发已发的理解二子在潭州之会前即无异论，至于论《中庸》之性之始异而终合，所据则未必充分。其实，中和问题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为对未发已发的理解，一为由此派生的功夫问题。朱子先前赞同了湖湘学者在前一个问题上的立场，而潭州之会则是进一步解决第二个问题，之后朱子始取湖湘学者“先察识后涵养”之说。而朱子对湖湘学之批评亦自对此功夫的反省入手，因此，中和新说的主旨则是在工夫论上，而未发已发问题则是派生出来的，这个过程与中和旧说完全颠倒过来。此其二也。

第三，束先生认为朱张潭州之会是一次全面的学术讨论。束先生从《文集》《语类》中考订出如下几个方面：一、论“主敬”；二、论“仁”说；三、论《中庸》学；四、论撰写《张浚行状》；五、批评湖湘学之禅气。六、对各自经学、史学著作之讨论。在此，束先生体现了非常细腻地爬梳材料的功夫，而前贤皆不及言之。

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指出的，年谱对于朱子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有旧谱，而有旧朱子学；今有新谱，当有新朱子学。因此，当王白田《朱子年谱》主导了二三百年的朱子学研究之后，束景南先生的《朱子年谱长编》作为一新谱，将使对朱子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想，这个期待将不会是过分的。

更新时间：2007年Jan月

点击次数：490

[【Top】](#)

©2006 www.sixiangshi.org 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 版权所有
上海聚中科技信息有限公司 FIT Tech. 提供技术支持 沪ICP备05026284号

[\[联系我们\]](#) [\[设为首页\]](#) [\[加入收藏\]](#)